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李大钊 确立政治信仰的引领作用

李 颖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 理解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 既不能忽视时代条件的推动作用, 也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作用。“五四”以前, 李大钊矢志追寻的民族解放理想在现实面前陷入困境。与此同时,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话语与方法已开始出现或渗透于李大钊的著述之中。李大钊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他自身的思想诉求之间形成了内在自洽, 从而引领李大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并不是单纯基于时势的情绪化选择, 而是一种基于比较、批判和鉴别的理性化选择。

关键词: 李大钊; 马克思主义理论; 政治信仰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23)02-0020-08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23.02.004

On the Leading Role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i Dazhao's Political Belief

LI Yi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Li Dazhao'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rxist, neither can we ignore the driving role of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nor the leading role of Marxist theory. Befor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goal that Li Dazhao was determined to pursue fell into difficulty in the face of reality. Meanwhile, prior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article *My Marxist View*, some Marxist discourses and methods had already begun to appear or permeate in Li Dazhao's writings. The Marxist viewpoints and methods that Li Dazhao initially mastered and his own ideological demands formed an inherent self-consistency, which made Li Dazhao change from a democrat to a Marxist. Li Dazhao's choice of Marxism is not emotional simpl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rational based on comparison, criticism and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Marxist theory; political belief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9B024)

作者简介: 李颖(1976—), 女, 福建长乐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对于李大钊是如何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界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①。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还鲜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并阐述其在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种研究的缺位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认为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基于特定时代条件和深重的民族被剥削感的情绪化选择。因此,沿着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基于李大钊最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几种观点和方法,分析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成为李大钊的选择并对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审慎性进行思考,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一、迷惘与怀疑:五四以前李大钊的理想追求和现实困境

1927年,身陷奉系军阀囹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李大钊曾自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2]297}诚然,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是李大钊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之前,他的努力却常常陷入无力与困顿之中。

(一)对“吾民安享之幸福”的矢志追求

“人民”是李大钊思想链条中始终关注的焦点,无论主张“惟民主义”“民主主义”还是“平民主义”均是如此。但“人民”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从来就不是政客们用以投机取巧的招牌,也不只是政论家们的学理模型,而是实实在在的最

广大、最底层民众,他们的生活福祉始终是李大钊的心之所系。李大钊批判民初中国的政党和为政者,“钻营运动、争权攘利之不暇,奚暇计及民生哉?”^{[3]9-10}他哀叹吾侪小民“得其所者,有几人哉?”^{[3]9-10}李大钊在深研政理的同时,总是以最深切的同情、最细腻的笔触关照着最普通人的生活。他呼吁为人力车夫备“一避尘口囊”“一双手囊”“雨衣雨帽各一具”^{[3]454},“俾奔走劳瘁之车夫,稍受涓埃之保护”^{[3]454};他对农民生计无恃之苦感同身受,指出农民“倘丰作一失,则生计之苦,殊难谋救济之途。以此思忧,忧可知矣”^{[4]216};他指出唐山煤厂“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4]436};他主张废娼,认为娼门里的女子“那一种愁苦、羞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4]452}。李大钊揭露民初中国只有“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3]9}。救民于倒悬、实现民族解放是李大钊矢志追寻的目标。为达此目标,他“为功为罪,所不暇计”^{[2]301}。

(二)对“第二文明”困境的思考

与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曾经是李大钊心中救民于倒悬的一种理想路径。在国内,辛亥革命虽在中国挂起了民主共和的牌子,但李大钊对民初以来的国内社会政治生态却极端失望,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3]7},并且一度将这种令人失望的现实症结完全归因于中国自身。他劳心焦思,发表《一院制与二院制》《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裁都督横议》《风俗》等一系列文章,意

① 主要研究著作如:张静如《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吴汉全《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王宪明、胡庆祝《李大钊思想文本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此外,相关论文更是数量众多,学者们一般从传统文化积淀、个体思想取向、时代环境等方面展开讨论,重点论述了民本主义、进化论思想、民族主义、个人经历与学术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日本学者、西方现代性反省思潮等对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图从法理、政理以及国民意识等方面弥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不足。袁世凯复辟帝制,李大钊为表反对不惜从日本弃学回国,并通过对中国政治的深刻反思提出适宜之政治应是“国法与民彝间之联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3]271},但总体上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认可态度并没有改变。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提出意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加之欧洲战局“战焰之腾,杀人盈野,惨痛万千”^{[3]339}。在这种背景下,李大钊对西方文明也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3]340}但此时的李大钊认为“‘第三’者,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3]340},因此,不久之后,他又在《宪法公言》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谈论宪法的文章,以求在中国建立“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3]387}。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国内产生的问题以及在国际上造成的创巨痛深固然可以引发李大钊的种种思考,但在获得新的思想工具之前,即便敏锐如李大钊也无法实现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超越。

(三)对“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迷惘

为匡救国势危殆、民生凋敝,李大钊曾汲汲于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思考“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2]297}。鉴于各省都督的“轶乎法范,暴戾恣睢,飞扬跋扈”,李大钊早在 1913 年就极力主张废督,认为“都督一日不裁,国权一日不振,民权一日不伸”^{[3]60}。但各省督军横行之局依旧,直至 1917 年督军团入京,继而安徽督军张勋上演复辟闹剧。对此,李大钊虽依然从学理上反复申论强力不足以治国,现代民主社会只应允许法律认可下的强力,但对于申说的效果,李大钊也只能承认:“暴力自身不为觉悟,吾侪末如之何,惟有听其自蹈于绝境,收其逻辑上应得之果。”^{[4]249}对于宪政的运行,李大钊曾主张“调和立国”,希望当局各方“自节其好同恶异之性,而尚有容之德”^{[4]36}。然而,社会的现实却是“调和论之在今日,几为敷衍迁就者容头过身之路,其黠者乃更窃为假面,以掩饰其挑

拨利用之行”^{[4]221}。对此,李大钊虽然同样极力申说调和之真义,但面对“举国无一真人”的现实,他也只能无力地指出,“今日最终之希望,惟在各派各人反省悔悟,开诚相与”,否则“谭浏阳‘大劫不远’之言,吾人将躬受其痛,同归于尽”^{[4]233}。此外,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影响,又接受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对于人民力量的关注由来已久。面对“将军变色于庙堂,豺狼横行于道路,雄豪自专其政柄,强藩把持其兵权”^{[3]158}的局面,李大钊曾把希望投注于“群众”的政治对抗力,他指出:“人物之势力,非其固有之物,与夺之权,实操于群众之手也。”^{[3]189}但尚未找到问题之根本的李大钊对民力也并不自信,他感叹民间“风俗之衰”^{[3]189},“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耳!”^{[3]74}总之,此时李大钊眼中的中国社会,诚如后来他与胡适的论战中所指出的:“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5]55}

二、理论准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和了解

李大钊 1914 年始就读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1916 年 5 月返回上海。据高一涵回忆,早在东京留学期间,李大钊“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了”^[6]。在此期间,曾翻译《资本论》第一卷并担任过李大钊任课教师的日本学者安部矶雄对李大钊有一定的影响。回国后的李大钊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持续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标志性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列宁”“马克思”“劳工剩余”“共产党宣言”“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用语已经开始出现在李大钊的文章中。这一时期李大钊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途径至少包括三方面。其一,日语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如日本学者安部矶雄、河上肇、福田德三、堺利彦等关于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著述或译作,以及如《新社会》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日文期刊。其二,英语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包括英文著述、英文期刊等,如英国的《泰晤士报》《隔周评论》,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评论》(原名《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等,这些刊物发表有各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述。其三,中文世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特别是《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述或翻译文章。至少经由上述途径,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下述几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就已经进入了李大钊的视野。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运动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基石之一。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散见于他的很多著述中,其中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至少经由河上肇的著作,李大钊对《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阐释的唯物史观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此外,与李大钊有密切联系的《晨报》副刊于1919年5月到8月间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等译文,也应该有助于深化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与思考。事实上,从1918年底开始,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李大钊陆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工人素质、劳动妇女等问题。

第二,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其中阐明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重要基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其标志性的著作。李大钊高度重视《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奠基意义。他认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高涨,“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7]。日本学者后藤延子通过中日文献

比对,认为出版于1913年的日本学者福田德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著作应该对李大钊产生过影响。1919年《晨报》副刊于当年4—11月间先后发表了《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劳动与资本》《马氏资本论释义》等著述或译著,这对于李大钊把握《资本论》的要义也应是一种滋养。实际上,从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已经可见李大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世界问题的端倪。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目前确无资料表明李大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曾经阅读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但拥有世界视野的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已经接触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却是肯定的。早在1917年5月,在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中,李大钊援引德国左派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的话指出,此次战争“乃为产业资本家、银行家制世界之市场,获得于掠夺之领土之政治管辖权而战,全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也”^{[4]196}。李大钊在纷繁的资料中摘引的这句话点明了“产业资本家”与“银行家”联合,瓜分“世界之市场”,引发“帝国主义之战争”,表达的正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精髓。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的历史观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必然”,指出了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革命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是体现其精神的纲领性文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至少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李大钊对《共产党宣言》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同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与李大钊有比较密切联系的几种刊物,如《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的“名著”专栏,《晨报》副刊1919年5月5日起连载的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都对《共产党宣言》有比较多的摘译。另外,创刊于1900年的英文刊物《社会主义者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应该也为李大钊认识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和解放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就引用了该刊第一号上刊登的恩格斯的文章用以说明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之间的

内在关系。实际上,从1917年4月李大钊开始关注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社会的革命”“世界革命”“劳工主义”“劳动联合”等渐渐成为李大钊文章中的高频词。这与李大钊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及十月革命的持续关注有关,也与其对《共产党宣言》等理论著作的关注有关。1919年7月,李大钊已经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了“这个阶级竞争说,是Karl Marx倡的”——“他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4]481}

三、人间正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李大钊的思想引领

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这个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在时代洪流中共同推动完成的,而李大钊早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有效纾解了他对中国问题的诸多思考困境,是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引领。

(一)引领发现真正“无产庶民”的“自由乡土”

1917年4月,李大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开始关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其首要原因在于他从中看到的是一股国民解放的潮流。他特别注意德国社会党左派领袖李卜克内西反对增加军费案的理由书,并援引指出,“此次之战,非各交战国民之所蕲,且非为德国或其他国民之福利而战”^{[4]196},“俄、德国民之解放,乃彼等国民本身之事业也”^{[4]196}。此后,梅林、卢森堡等欧洲社会党左派领袖以及普希金等同情底层民众的文学家开始出现在李大钊的文章中,与他们相联系的往往是“和平”“自由”“面包”“人道的理想”“平民的同情”等主题。在1918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首次提到了“马克思(Marx)”,并把马克思奉为俄德革命的社会党的“宗主”。在该文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初步的,但就其初步的理解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他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最朴素的动机。那是因为在李大钊看来,Bolshevism代表着“‘多数’的意思”,主张建立“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4]363-365}。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能成为李大钊的思想选择,首先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和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李大钊发现了他深切关怀的“吾侪小民”^{[3]8}的解放曙光。诚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8]

(二)引领认清“强盗世界”的本质及规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大钊曾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于“贪与堕”^{[4]34},也曾经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报以厚望,认为“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3]458}。但随后在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中,李大钊渐渐改变了最初的看法。1917年5月,在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察中,李大钊敏锐地注意到德国左派社会党人对战争原因的不同分析。他援引李卜克内西的话指出,此次战争“乃为产业资本家、银行家制世界之市场,获得于掠夺之领土之政治管辖权而战,全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也”^{[4]196}。此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逻辑开始出现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成为李大钊自己思考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具。在1918年11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方法剖析了战争的原因,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4]358}1919年元旦,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提出解决的方案,希望“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

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4]377}。在这篇文章中,“劳工阶级”“劳动剩余”“生产者的结合”“总同盟罢工”等极富《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色彩的语汇被李大钊高频且灵活地运用着。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掌握改变了李大钊此后对待国际国内资本主义的态度。在国内,李大钊从此不再对所谓宪政作补苴罅漏式的努力,转而质问国内那些“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的政客,可知“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4]387}在国际上,巴黎和会的召开牵动着国内关心时局的各方人士的目光。李大钊对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的强盗行径也极其愤怒,但相对于此时对资本主义国家尚抱有幻想、在巴黎和会期间发表了近30篇针对和会的文章的陈独秀而言,李大钊其实是较少对巴黎和会发表言论的。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李大钊仅仅发表了11篇与和会相关的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短评,有3篇还是在和会结束后的6月29日发表

的(见表1)。这并不是因为李大钊没有沉重的民族被剥削感,而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李大钊对此已经有了与陈独秀完全不同的解决思路。1919年4月6日,李大钊和陈独秀合办的《每周评论》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列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十条措施,并且在按语部分特别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的“要旨是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9]。1919年5月18日,面对西方列强的强盗行径,愤怒的李大钊直接撰文表明了阶级斗争的立场,他指出:“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4]459}

综上可见,李大钊是通过其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及规律的分析理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理论,看清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强盗逻辑”,放弃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并作出了新的道路选择。

表1 巴黎和会前后李大钊发表的与巴黎和会相关的文章

序号	篇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1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1919年元旦	
2	《面包问题》	《每周评论》第5号	1919年1月19日	短评
3	《放弃特殊地位》	《每周评论》第6号	1919年1月26日	短评
4	《秘密外交》	《每周评论》第9号	1919年2月16日	短评
5	《强国主义》	《每周评论》第13号	1919年3月16日	短评
6	《统一癖》	《每周评论》第16号	1919年4月6日	短评
7	《白人阀》	《每周评论》第16号	1919年4月6日	短评
8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每周评论》第22号	1919年5月18日	
9	《新华门前的血泪》	《每周评论》第28号	1919年6月29日	短评
10	《哭的笑的》	《每周评论》第28号	1919年6月29日	短评
11	《威先生感慨何如?》	《每周评论》第28号	1919年6月29日	短评

(三) 引领找到“真正的解放”的路径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接连发表几篇文章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潮。在1918年12月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已经相对清晰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路径,即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4]364-365}。此后,国内南

北军阀间的和谈与国际上的巴黎和会牵动了舆论界大多数人的视线,但观察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发表的47篇政论文章或短评会发现,其中与两个和会相关的只有13篇,而与民众问题、社会革命潮流相关的却多达20篇,而且一半都是长篇论述文章(见表2)。很明显,此时转移李大钊关注点的不是时局的变化,而是他此时正在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对李大钊思考方法的影响。如对于自杀问题,李大钊指出:“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4]385}又如对于废娼问题,李大钊认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

可。”^{[4]454}而对于社会组织的根本改造,李大钊也毫不隐讳自己源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他指出,“这个阶级竞争说,是 Karl Marx 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4]481},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4]482},“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4]492}。

表 2 巴黎和会前后李大钊发表的与民众问题、社会革命潮流相关的文章

序号	篇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1	《新纪元》	《每周评论》第 3 号	1919 年元旦	
2	《北京的“华严”》	《每周评论》第 5 号	1919 年 1 月 19 日	短评
3	《新自杀季节》	《每周评论》第 5 号	1919 年 1 月 19 日	短评
4	《政客》	《每周评论》第 6 号	1919 年 1 月 26 日	短评
5	《平民独裁政治》	《每周评论》第 6 号	1919 年 1 月 26 日	短评
6	《过激乎? 过愤乎?》	《每周评论》第 6 号	1919 年 1 月 26 日	短评
7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新潮》第 1 卷第 2 号	1919 年 2 月 1 日	
8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晨报》1919 年 2 月 7,8,9 日	1919 年 2 月 7—9 日	
9	《劳动教育问题》	《晨报》1919 年 2 月 14,15 日	1919 年 2 月 14,15 日	
10	《战后之妇人问题》	《新青年》第 6 卷第 2 号	1919 年 2 月 15 日	
11	《青年与农村》	《晨报》1919 年 2 月 20—23 日	1919 年 2 月 20—23 日	
12	《普通选举》	《每周评论》第 10 号	1919 年 2 月 23 日	短评
13	《光明与黑暗》	《每周评论》第 11 号	1919 年 3 月 2 日	短评
14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	《每周评论》第 12 号	1919 年 3 月 9 日	
15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晨报》1919 年 3 月 14—16 日	1919 年 3 月 14—16 日	
16	《解放后的人人》	《每周评论》第 17 号	1919 年 4 月 13 日	短评
17	《宰猪场式的政治》	《每周评论》第 18 号	1919 年 4 月 20 日	短评
18	《汽车与邮片》	《每周评论》第 18 号	1919 年 4 月 20 日	短评
19	《废娼问题》	《每周评论》第 19 号	1919 年 4 月 27 日	
20	《“五一节”(May Day)杂感》	《晨报》1919 年 5 月 1 日	1919 年 5 月 1 日	

总之,细致爬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的李大钊著述以及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和方法,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李大钊早期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他自身思想诉求之间的内在自洽,即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无产庶民”的“自由乡土”正契合他对“吾民安享之幸福”的矢志追求,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和规律的揭示纾解了他对“第二文明”的思考困境,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无产阶级“真正的解放”的路径打破了他寻找“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迷惘。因此,理解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绝对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引领作用,可以说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下思考中国问题、化解自身思想困境的过程。

四、余论

关于李大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原因,有研究者认为“欧洲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政治行动之前,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长期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信徒与这些人不同,他们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之前,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意义的理解,几乎全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之外”^{[10]63},甚而指

出虽然在1919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要远逊于他对俄国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敬意”^{[10]78}。在笔者看来，这种认识是失之偏颇的。因为十月革命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如李大钊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世界潮流并且波及远方的中国。相反地，到1919年上半年，德国革命遭遇挫折，苏维埃俄国也面临外部的军事干涉和内部的反革命力量的威胁，但李大钊对民众问题及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关注却不减反增。实际上，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看到的从来就不是具体的革命行为，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和精神。1920年苏俄政府关于归还沙俄时代在中国获得的权益的通告传到国内并引起舆论界一片赞誉之声，而李大钊却在此时提醒青年学生记住“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5]230}。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表述更加清晰，他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它给中国先进分子真正的帮助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1]。事实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后不久，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1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12月1日）等，从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解绝非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之外”。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如果将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简单归结于独特的时代条件，那么这样的选择就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时势和民族被剥削感而产生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选择。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过程中经常看到的是比较、批判、鉴别的理性思考痕迹。《晨报》副刊被认为是与李大钊有着密切联系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从1919年2月7日李大钊协助《晨报》对第七版（即后来的副刊）进行改良，到1919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发表以前，《晨报》副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同样用不少的篇幅介绍了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在此期间，《晨报》副刊刊登的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的文章共6篇（见表3），其中《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一文连载了12天，旨在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已无价值”，而随着科学文化的发达，也已经“证明马氏唯物史观的无理”^[12]。《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是李大钊主编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这期专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但同期还刊登了《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两篇文章。《马克思学说》对马克思学说既有介绍，亦含批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的作者是“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文中对马克思学说虽有所肯定，但明显以批评为主。即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李大钊也专辟第七节，‘把对其说的评论，举出几点，并述我的意见’^{[5]18}。在这一节中，李大钊总体上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也指出其‘小小的瑕疵’^{[5]19}及‘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5]23}。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李大钊那里从来就不是不能加以批判鉴别的教条，而是一种不惧怕审慎比较的真理。而李大钊对于真理的态度从来就是‘吾人断不可举其自我以贡崇奉偶像威灵之牺牲，仅可取其传说之几分以为发育自我性灵之资养’^{[3]427}。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13]对于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原因的探究，既不可忽视时代条件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作用。（下转第75页）

- 一) 解读[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314.
- [15] 柳经纬, 张润. 债的概念和体系: 以《民法典》第118条为中心[J]. 海峡法学, 2022(1): 3-17.
- [16] 陆青. 债法总则的功能演变: 从共同规范到体系整合[J]. 当代法学, 2014(4): 59-69.
- [17] 杨绪峰. 权利行使在财产犯罪中的类型化解读: 以取回所有物和实现债权二分为视角[J]. 政治与法律, 2014(11): 37-48.
- [18]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EB/OL]. (2019-11-14)[2022-04-17].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99691.html>.
- [19] 覃远春. 论“赌债”分离可能性及其司法处理: 自然债之于传统问题民法新视角的贡献[J]. 河北法学, 2011(9): 96-106.
- [20] 冯洁语. 论赌博借贷的民法教义学构造: 以从赌博到赌博借贷的公私法体系透视为线索[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报), 2020(4): 139-149.
- [21]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EB/OL]. (2019-04-09)[2022-04-19]. <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50192.html>.
- (责任编辑: 李秀荣)

(上接第27页)

表3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前《晨报》副刊发表的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的理论文章

篇名	作者或译者	发表时间
《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渊泉	1919年4月1-3日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渊泉(译)	1919年5月5-6, 8日
《劳动与资本》	食力(译)	1919年5月9日-6月1日
《马氏资本论释义》(1-43)	渊泉(译注)	1919年6月2日-7月17日
《马氏唯物史观概要》	译者不详	1919年7月18-24日
《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译者不详	1919年7月25日-8月5日
《马氏资本论释义》(44-138)	渊泉(译注)	1919年8月6日-11月11日

参考文献:

- 民出版社, 2013: 59.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424.
- [9] 舍. 共产党的宣言(摘译)[N]. 每周评论, 1919-04-06(2).
- [10] 莫里斯·迈斯纳.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 译.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1.
- [12] 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一)[N]. 晨报, 1919-07-25(7).
- [13] 习近平.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 前进论坛, 2022(1): 32-33.
- [1]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6.
- [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4]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5]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五四运动回忆录[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154.
- [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 第4卷[M]. 北京: 人

(责任编辑: 白丽娟)